

-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生研讨课系列教材 -

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研究

黄发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生研讨课系列教材 -

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研究

黄发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研究 / 黄发有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0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生研讨课系列教材

ISBN 978-7-305-11329-1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传播媒介—关系—中国
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②传播媒介
—关系—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教
材 IV. ①G206.2 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871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生研讨课系列教材
书 名 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研究
著 者 黄发有
责任编辑 李廷斌 施 敏
责任校对 郭艳娟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5.5 字数 243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329-1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件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南京大学文学院始终把培养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和开拓创新能力的研究型中文人才作为我们本科生培养工作的根本目标。为此,南京大学文学院自始至终都坚持对本科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作为人文学科的本科毕业生,如果仅仅只是熟练掌握了一套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没有根本培养起独立的批判眼光和深厚的人文精神,那将是我们大学教师的严重失职,是我们大学人文学科本科教育的根本失败。南京大学文学院作为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院系,理应担当起培养具有独立品格和思想的人文人才之重任。欲至此目标,对学生思考力的培养则成为教学之关键。由此,南京大学文学院曾于2007年推出了一套“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中国语言文学类”的8部“研究导引”,作为我们本科教学中重要的教材,旨在培养文学院本科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培养其学术研究的眼光。与之相配套,文学院针对高年级本科生陆续开设了“高年级研讨课”,以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受到中学语文教育之弊端的影响,一年级新生往往对大学中文专业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见,无法很好地适应研究型大学中文专业的培养模式,对中文专业的学术研究活动相当的陌生。这就会影响到高年级研讨课的质量和效果,进而影响到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质量。因此,要真正在本科阶段培养起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必须让一年级新生一入学就能够有机会领略学术研究的方法,感受到学术研究的乐趣,尽快地摆脱中学语文应试教育模式的束缚,培养起独立思考的能力。为此,文学院开设了一系列的“新生研讨课”,内容涵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和戏剧影视等文学院主干专业方向,让一年级新生在踏入大学校门之际就能够有机会体验到大学阶段学术探讨的快乐和艰辛,近距离地感受知名学者的学术风范,彻底地摆脱中学语文

应试教育重知识点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而忽视思想的启发之弊端,为他们将来顺利地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做充分的准备。这一套“新生研讨课系列教材”即是我们近年来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成果。

文学院近年来开设的系列新生研讨课都是由文学院学养深厚的教授主讲,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博士生导师,是文学院各个专业的学术骨干。由这批学识精深的学术骨干来给一年级新生主讲研讨课,其实也是对他们们的一个考验:考验他们能否在课堂上将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见解深入浅出地讲解给一年级的同学;能否把自己学术研究的观点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能否在讲授专业基础知识的过程中通俗明晰地把该学科最本质的内涵,把学术界最前沿的观点和争论化做一个个能为一年级同学所理解的具体的问题,供他们讨论。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情。这项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写专业学术文章更困难。然而可喜的是,文学院一批有着相当学术成就的学者献出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把新生研讨课变成了他们展示自己学术观点、讨论学术前沿问题的特殊平台。这套“新生研讨课系列教材”便是他们这些努力的结晶。

教学相长,文学院始终把课堂教学视为推动教师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动力。我坚信,这套教材的出版,不仅将提升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教学,特别是本科低年级教学的水平,而且终将使文学院的学术研究从中受益。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为文学院这套教材的顺利出版所做的一切。我相信,这套教材作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教学改革的呈现,对中国研究型大学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培养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2013年3月

◎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传媒与新时期文学生态	
第二章 文学风尚与时代文体	
——《人民文学》(1949—1966)头条的统计分析	18
第三章 先锋文学与期刊分化	50
第四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改制	64
第五章 文学出版的文化转型	81
第六章 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	96
第七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当代文学	115
第八章 网络文学的可能与限度	146
第九章 汉语网络文学的发展轨迹	158
第十章 影视时代的小说危机	171
第十一章 当代文学评奖的文化反思	205
第十二章 传媒趣味与文学症候	222

◎ 第一章 文学传媒与新时期文学生态

文学史是作者、作品、读者的三位一体,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只是占少数比例的、专业的读者群,作者本身同样需要阅读作品,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算是健全的文学史。但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一般是指称 1949 年以来的大陆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因袭了传统的文学史观念,一直偏重对思潮演变的审视和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即将文学史理解成了作家作品的罗列史,忽略了文学的功能史与作用史,忽略了文学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忽略了读者(包括批评家、学者、翻译家、编辑、文艺记者、文艺官员等专业读者)在文学史上的功绩。通过考察传媒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从传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探寻文学的传播接受对文学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渗透,能够拓展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修正文学史研究中的偏失,摆脱一些历史盲点和思维惯性的负面影响,对被以往文学史所遮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进行再解读,对曾经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进行新的开掘,使文学史研究变得更加健全和完善,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环节。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由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尧斯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提出来的,其代表人物尧斯、伊瑟尔、福尔曼、普莱森丹茨、施特利德、瑙曼等均为德国的文艺理论家和教授,尧斯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伊瑟尔的“暗隐的读者”“召唤结构”和“游移视点”,瑙曼的“接受前提”等概念与阐释,在反思传统文学研究的弊端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地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另一片天地。与接受理论相互呼应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崛起于欧美,吉布森的“冒牌读者”说、普兰斯的“叙述接受者”理论、里法泰尔的“超级读者”概念、斯夸尔和威尔逊的阅读反应实验研究、菲什的“感受文体学”理论、普莱的“内在感受”说、乔纳森·

卡勒的“文学能力”说,从不同角度围绕着文本这一核心,分析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读者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大大提升了读者在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有力地拓展了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研究视野。但是,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的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接受史在西方学界同样罕见。将文学的传播史与接受史有机地进行整合,更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文学传播学与文学接受史都是正在生长的学科,还需要逐步完善,而文学的传播接受与公众信息的传播接受又有很大区别,因为文学的传播接受包含一个审美再创造的过程。

研究文学的传播接受,还应该从传播学中的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学说中吸取营养,诸如威尔伯·施拉姆对“传播的过程和效果”的综合分析、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宣传分析”理论、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库尔特·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卡尔·霍夫兰的说服研究、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克罗德·香农的信息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是讯息”和“地球村”理论、鲍德里亚的“模拟”和“内爆”理论,都能够给研究带来理论启迪。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也是重要的理论参照系,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概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都能拓展研究的文化视野。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和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能够给这一研究领域提供更加直接的理论指导。国内的新闻事业史研究,与本书关注的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和跨媒体传播,在研究对象上有交叉之处。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教授和复旦大学的丁淦林教授都有丰硕的成果,对他们的成果的借鉴,能够有益于深入分析文学传播的模式与特性,并比较透视文学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的异同。对前述理论的兼收并蓄,都必须以发掘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史料、掌握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与前沿成果作为基础,避免将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剪贴与拼凑,真正给当代文学研究引来源头活水,实实在在地将文学的生产表现与传播接受置放在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多元的文化系统中,进行全景的、立体的研究。

一、透视媒介

在现代文学领域,张元济、张静庐、邹韬奋、茅盾、赵家璧、巴金、叶圣陶、黄源、柯

灵等著名编辑家的回忆录,唐弢、黄裳、姜德明、倪墨炎、陈子善等的书话,李欧梵、陈平原、王晓明、吴福辉、陈万雄等的报纸副刊与文学期刊研究,龚明德、王建辉、杨扬、金宏宇等的文学出版与版本变迁研究,汪晖、马以鑫、王本朝等对文学制度与文学接受的研究,立体地揭示了媒体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多元互动。当代文学传媒的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最近几年才渐入佳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繁荣,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与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在最近十年的高校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文学传媒研究是一个热点;但这些成果大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研究,纯粹以现成印刷资料为依据的材料汇编与印象式文字,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急需更加系统而深入的学术推进,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是尤其薄弱的环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黄秋耘、韦君宜、秦兆阳、范用、沈昌文、何启治、黄伊、许觉民、龙世辉、朱正、范若丁、丁景唐、王维玲、涂光群、崔道怡、张守仁、聂震宁等编辑家的著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①,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②和《问题与方法》^③,陈思和的期刊出版研究以及主编“火凤凰”和《上海文学》的实践,孟繁华的《传媒与文化领导权》^④,吴俊的《人民文学》研究,程光炜的《文艺报》和诗歌传媒研究,吴秉杰、於可训和洪治纲对文学评奖的论述,李频的《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⑤《编辑家茅盾评传》^⑥《期刊策划导论》^⑦和《大众期刊运作》^⑧等著作,靳大成主编的《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⑨,林舟的《文学空间的裂变与

① 潘旭澜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收入了大量文学机构、文学会议、当代文学政策的主要文件、文学报刊方面的词条,附录中还有“1978—1991全国文学奖一览”和“文学刊物刊名变更情况一览”等内容,这本来是他主持编写当代文学史的资料准备工作,遗憾的是,他构想了很长时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②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④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⑤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 李频:《编辑家茅盾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⑦ 李频:《期刊策划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⑧ 李频:《大众期刊运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

⑨ 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

转型》^①，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②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考察媒体文化与文学变迁的复杂关系。遗憾的是，不少学者将文学的传播接受作为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忽视了对文化语境、传播接受对象的具体考察，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缺乏对媒体在文学资源调节和配置的流程、功能和基本规律进行动态考察，一些研究文学接受史与文学传播学的论文，更是表现出将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剪贴与拼凑的倾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一般读者中的文化传播及其阅读反应，目前尚无系统的学术成果问世。至于综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在大陆、台港澳、海外华人社区以及非华人社会等地区的传播接受模式，更是处于空白状态。

在研究路径上，我认为扎实的文本细读和个案分析是基本前提，这是研究主体对作品、作家、读者和文学必要的尊重，更是对自己最起码的尊重。近年，随着文化批评的流行，学术界对文学传媒的研究也多有大而无当之处，不少学者习惯采用了聪明的“抽样分析”，随便读了几本杂志、几本图书、几部影像作品，就可以纵横驰骋地大谈文学传媒的历史源流与当代走向，流于空泛的现象描述与草率的价值评判。我个人以为，文本细读不仅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脱离了具体的文本，不仅无法研究文学的形式特点和审美品格，也无法研究外部力量对于文学的影响与渗透。现在流行的文化批评，往往把文学作品的精神表达作为社会政治分析的文化依据。须知，严格意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分析必须通过解剖真实的案例来进行分析与归纳，而根据感性的、虚构的文学经验来介入社会现实，这固然使话语表达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但是，其主观性、臆测性显然会产生误导作用。

说到文学生态，就不能不提到生态学的理论。唐纳德·沃思特在阅读了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之后，意识到了“人类要控制和管理自然的毁灭性的倾向”，而且“知道了生态学这门新的学科，它揭示了植物与动物之间相互关联以及有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各种复杂方式”^③。比利时科学家P. 迪维诺认为：“生物群落与其生活环境中的各种非生物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各种无形的链索将群落与环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光照、温度、周期性、湿度以及各种化学因素等都对生物群

① 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唐纳德·沃思特：《中译本序》，《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落产生影响。组成生物群落的一切有机体,将这些有机体联结在一起的各种食物关系或分布关系,以及它们和环境之间的一切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了生态系统。”^①在生态学的视野当中,文学固有的等级关系就应该被深刻质疑,我们不能用单一标准来判断复杂而多样的文学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共同历史时空中的所有文学存在当成有机的生命系统,平等地看待它们的存在价值,而不是唯我独尊地以一种价值形态排斥其他的价值形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每一种文学形态在功能系统中的独特位置,才能维持文学的总量与结构平衡。就自然生态而言,生物的多样性增强了环境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环境恶化的重要表征,“在退化的情况下,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转变成单调的生态系统时,伴随出现的将是由稳定变成不稳定”^②。与此相应,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某种性质、功能单一的文学形态一元独大时,文学的环境也呈现出恶化的趋向,典型如“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文学的政治功能的极度膨胀,严重地破坏了文学的结构平衡。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商业与娱乐功能不断地得到复原,同时呈现出失控的媚俗倾向,媒体在摆脱了过分严厉的政治控制的情境之中,商业趣味抑制了审美趣味的自由生长,审美的多样性让位于消费美学的单一性。因此,媒体“制造”文学的冲动过于强烈,显然会窒息文学多种可能性的自然生长。而且,文学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震荡,无法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文学在连续性的、自由竞争的、多元共存的、在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平稳过渡的环境中走向繁荣。在文学的精神生态中,各种力量必须在相互制约中相互依存,如果某种力量成为绝对强势的权力,不管这种力量是政治、商业还是传媒,权力意志都必然使文学自身的规律遭到破坏,文学的独立性遭到摧毁性的打击,文学的形态将变得单一、僵化,被纳入森严的等级体系,依附性和寄生性的工具化写作也必然带来文化的污染。

从文学生态的视角来看,文学的传播接受既与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特性密切相关,又受制于政治、社会、经济、习俗、文化的合力,这就使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现实功能既和谐又冲突。为了准确地描述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的历史轨迹,既要考察审美价值较高的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又要考察艺术较为粗糙而社会影响较

① P. 迪维诺:《生态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② P. 迪维诺:《生态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

大的文学作品的文化功能,比如迎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文学和追逐时尚趣味的文学。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批评家、编辑的生存状况、社会角色、精神结构、命运变迁与文学的传播接受的关系,在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中都被严重地忽略,我一直希望就此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得到实质性的突破与提升。文学的传播接受史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史有着重要关系,但文学的传播接受史并非文学报刊与文学出版的事业史,媒介对传播接受的主体和客体所产生的双重作用,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既强调传播模式、接受趣味、文学功能的历时发展,又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大陆、台港澳与海外华人社区、非华人社会等不同地区的传播接受进行共时性考察;既分析当代文学在传播接受中的文化特性,又探索它在翻译过程中的二次创造、文化阐释与误读现象;既注重文学作品在传播接受过程中产生的读者反应与社会效果,又考察读者反应与社会效果对文学发展的反向推动,深入研究传播接受对文学的社会地位、思潮流派、价值选择、主体意识、审美趋向、文体演变等方面的影响与制约,突出文学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双向互动;既对专业读者群——批评家与文学史家的读者反应进行系统研究,对文学编辑、记者、翻译家等在传播接受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的特殊读者群的阅读反应进行搜集整理,又对一般读者的阅读反应进行抽样分析,尤其关注的是那些被公开发表并产生社会反响的读者来信、读者调查,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图表与数学模型进行量化考察与文化分析。

二、印刷传媒

在人类文明史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革新无疑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让炎黄子孙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祖先为这两种技术贡献了里程碑式的杰出创造。尽管影视和网络的出现,不断地挑战着印刷传播的地位,但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发展史上,影视和网络传播扮演的依然是配角,印刷传播所主宰的文学写作与文学阅读依然是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主流。在印刷传播中,报纸、期刊、出版三分天下,报纸的覆盖面最广,其传播趣味也与大众口味最为接近,公众影响力也最大。在“文革”后文学的发展里程中,报纸与文学的关系逐渐疏离,新时期初年的主流报纸还大量

刊发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与评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版面逐渐萎缩,硕果仅存的文学版面主要发表小品文与随笔,也有一些报刊专门辟出版面连载畅销小说,消费趣味日渐突出。20世纪80年代的各级党报和晚报,几乎都有文艺副刊,有些报纸还有文艺评论方面的专版,对文艺现状和走势进行敏锐而具有深度的评说,这就弥补了发表在“教科文”或“文化”版上的文艺新闻的简约与粗疏。有意思的是,90年代以来,不少报纸取消了文艺评论的版面,一些晚报干脆把文艺副刊也给取消了。有那么一阵,不少报纸设置了读书版,偶尔也刊登一些文学书评或文艺短论,但很多读书版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改换门庭,或者靠书商或书店的赞助,成天发表一些投桃报李的书评,同时发布各种图书销售排行榜。目前硕果仅存的高水平文艺评论专刊,当数《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文艺评论”版,《光明日报》的“文艺观察”版和《文汇报》的“文艺百家”版;而各省的党报一般都在文艺副刊上刊发文艺评论,但载文数量极少。在《作家报》《文论报》相继停刊后,以文艺评论为主业的报纸仅存《文艺报》和《文学报》。在这种情境下,多数市民报纸都在文化娱乐版面发布文艺信息,被纳入那些成天跟踪影视明星和文化掮客的“娱乐记者”的版图。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初期,大量市民报纸创刊,“专栏”文章风行,这是对那些曾经独领风骚的、大而无当的文艺的反拨,为散文创作的闲适潮流助长声势。被长期拒斥的性灵以拒斥沉重的面孔登台亮相,不幸的是,这种反叛最终被传媒的商业意志所利用,性灵沦落为时尚化、格式化的小资情调,沦落为一种商业品牌。当个人世界代替了一切,日常生活的吃喝玩乐成为百咏不厌的话题时,真正的悠闲和旷达就消失了。从“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到90年代以来遍地开花的专栏写作,文学风尚的变迁真可谓翻天覆地。从个案分析的角度来看,《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光明日报》“文荟”副刊、《文汇报》“笔会”副刊、《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等具有悠久历史的副刊,值得深入考察,这是探讨报纸副刊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的审美影响的有效途径。下面重点探讨的是期刊、出版与文学生态的关系。

新时期初年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文学期刊动辄发行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份,期刊在文学传播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作为思想解放的助推器,文学承担了拨乱反正与振兴中华的时代重任,一篇新作引发轰动效应的现象层出不穷,文学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当时的文学期刊稳坐钓鱼台,不管杂志办得如何,都不用操

心没有读者。经过十年“文革”的精神禁锢,人们正处在一个精神饥饿时期,对于精神食品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在当时的文学格局中,文学的潮涌方向明确,在迫切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驱策之下,文学主体在价值趋向和审美选择方面,惊人地一致,达成了共识。文学期刊也就大同小异,省级文学期刊几乎都是仿照《人民文学》的办刊路线,文学动向和文学信息也呈现出从中心向地方扩散的运动规律,文学期刊也被无形地纳入从上到下、按照行政级别划分辐射区域的文化秩序,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的文学期刊,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当时的省级、地市级的文学刊物都是封闭式的,这不仅是约定俗成的惯例,还是一种行规,试图打破地域限制就是僭越。从文化管理的角度看,越级就是违规和失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多文学杂志改名,《××文艺》几乎都改成了《××文学》,山西的《汾水》改成了《山西文学》,《黑龙江文艺》《广东文艺》《江苏文艺》《浙江文艺》《河南文艺》《江西文艺》分别恢复其曾经用过的刊名《北方文学》《作品》《雨花》《东海》《奔流》《星火》,一时成为风潮。这种“正名”和90年代后期的改版,立意有所不同,前者旨在政治上的反正,后者重在应对市场挑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潮流逐渐呈现出多水分流的倾向,文学创作在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歌,从伤痕、反思到改革文学的推进过程中,风情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在交替并存的递进中相互补充,相互衬托,显示出文学异质的艰难生成与模糊状态。除了《人民文学》因其官方色彩和悠久的办刊历史而享有独特地位外,《当代》《十月》在新时期初年就奠定了其坚持现实主义的底色,而更多的代表性文学期刊却是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过渡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像《北京文学》对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的风情小说的激赏,《上海文学》对寻根文学的推举,《收获》对先锋文学的集中展示,《钟山》为新写实小说鸣锣开道的“大联展”,都成为其办刊史上辉煌的一页,也在林立的文学期刊中为自己赢得了文化尊重与象征资本。

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的涌动和启蒙思潮的低落,使文学逐渐地走向边缘,文学期刊在影视、市民报纸的冲击之下,也相应地走向边缘。穷则思变,90年代前期,文学期刊的第一波改版如暗潮涌动,《山花》与《天涯》就是其中的弄潮儿,分别在1994年和1995年年底树起改版的旗帜。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大潮的激荡,使

文学期刊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政府财政支持的缩减与“断奶”,更是加剧了期刊的危机。在整体性困境中,一些老牌文学期刊如《收获》《当代》《十月》在总体策略上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仅仅在局部作出一些调整;但不少文学期刊汇入了改版的潮流。就改版模式而言,大体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放弃文学性的代价迎合大众趣味;二是在坚持文学性的前提下,走雅俗共赏的路子。1983年7月王成刚将《长春》改为《作家》,震动了当时的文坛;1994年接任主编的宗仁发,再度发动改版风潮,在变化中寻求突破。《作家》的两次基本成功的改版,应当有不少经验与教训可供借鉴。

当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文学杂志肯定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在变化的同时也要坚持文学的目标、理想和追求,不能放弃。像《湖南文学》改成《母语》不久后就停刊了,《东海》折腾一阵后也停刊了,《天津文学》改成《青春阅读》后再改回原名,《西湖》改成四不像的《鸭嘴兽》后又在近期改回原名,《海峡》眼看校园文学的路子走不通了,2005年改成了《海峡钓鱼》。放弃或者减弱文学性,并不意味着市场化追求就一定能够实现,有时这种牺牲还得不偿失,一方面失去了原来的铁杆读者,另一方面又很难争取到那些真正把阅读当成消遣的读者。在文学与市场之间徘徊,很可能两边都不讨好。

现在很多省级文学月刊大多都缺少变化,而且有重复办刊的倾向。这和“小而全”的办刊模式有关,它们的篇幅容量有限,但总是包容小说、诗歌、散文三大板块,有些还兼顾评论,这种办刊风格显得零碎,很难有自己的特色。在小说方面,它们主要刊发短篇小说,数量颇大却少有佳作,这似乎也 and 它们在质量上把关不严有一定的关系,每期都有几篇短篇小说,这都有点填充版面和凑数的味道。其实,一家杂志可以灵活一点,某种文体的稿件质量比较高时,就多给它一点版面,没必要雷打不动地平均用力。与其总是发表几个水平参差不齐的短篇,有时也不妨集中版面发表一个质量有保证的中篇。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短篇小说好像是很不景气的文体,事实上其产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关键在于质量问题。

《短篇小说》是吉林省吉林市的地市级刊物,其前身《江城》也走名家路线,近年选择了“业余作者”这条路线,其定位是专门办给业余作者看的,发行量大概有两万册。这两万册的订户里估计有一大半是它的业余作者,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杂志,

也表明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这家杂志的定位很清楚,就是没有一个名家。如果请名家写稿子,多是为了指导作者,为业余作者的作品作点评。^①《短篇小说》的作者队伍辐射到全国各地,在文体上专攻短篇小说,走专门化经营的路子。它不是百货齐全的豪华超市,而是专卖某类商品的特色小店。而很多杂志的定位模糊不清,在中间地带徘徊,在名家与有潜力的业余作者之间摇摆,犹豫不决。片面追逐名家的结果,很可能只拿到名家的下脚料,这对于提升杂志的地位毫无作用,而且还挤掉了业余作者和年轻作者的发展空间。再比如《天涯》,其主打栏目“作家立场”和“民间语文”,这是别的杂志没有做的东西,它并没有把小说、诗歌放在主体位置上考虑,这就是扬长避短,它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办刊物。

新世纪初年,一刊多版是文学期刊的重要趋向。像《收获》《钟山》《十月》《作家》都有长篇小说的“增刊”或“专号”,《当代》和《小说选刊》办起了长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办起了《中篇小说月报》,《短篇小说》也办起了选刊版,像《山花》《美文》办起了上、下半月刊或A、B版,还有一些刊物从双月刊改成了月刊,诸如《文艺研究》。比较特殊的是《小说家》,它本来与《小说月报》是两刊,后来变成了《小说月报·原创版》和《小说月报·选刊版》,这等于是“两刊一版”;但这次改版大大地提升了《小说月报·原创版》的发行量,从几千份攀升到十几万份。这种“一刊多版”现象让我想起了另一种“一刊多版”现象。“十七年”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政策限制比较多,个别刊物印好了,但送审后不过关,杂志只好把有问题的稿件抽掉,将备用稿件补充进去,再出一个新版,不少杂志都遭遇过这种情境,像《中国》1986年第12期终刊号、《朔方》1987年第1期、《百花洲》1988年第4期就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新世纪的“一刊多版”,反映了信息更新的加速。期刊以刊代书和出版界以书代刊的经营策略,表明期刊与出版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向,两者都追求规模效应,在发行上走多元化路线。更值得注意的是,期刊的扩版、增版,也表明了一种唠叨的、量化的、速成而高产的、缺乏节制的文风日益盛行,泛滥成灾。

非常有趣的是,“文革”后的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既相互协作,也相互竞争。从“十七年”到20世纪80年代,在计划体制的规范之下,为“遵命文学”保驾护航是文

^① 参见笔者与宗仁发的访谈录《站在作家与读者中间》,《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学出版的主要任务。而且,作家们只有在报刊上尤其是有重大影响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高水平作品时,才能进入出版社的视野。也就是说,不是谁都能出书的,出版作品集或长篇小说是一种荣誉,也是对作者的文学业绩的认可。这样,在文学的传播方式上,无形地形成了一种等级结构,文学期刊有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的区分,文学期刊是文学出版的作者培训基地,而文学出版对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与审查,是文学期刊的试金石。

以小说出版为例,文学出版体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几经曲折,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出现了重大转型。50年代,长篇小说出版是文学出版中的亮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①出版的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艾芜的《百炼成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德英的《苦菜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这些作品共同构筑起革命历史小说(红色经典)的核心模式。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使文学创作遭受重大挫折,不少受到批判的作家停笔,一些继续写作的作家则难有发表与出版的机会。60年代初期,随着极“左”思潮的愈演愈烈,文学创作与出版迅速黯淡。《保卫延安》被扣上了为彭德怀翻案的罪名,被禁止销售;在《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连载以听取修改意见的《刘志丹》,也被污蔑为替高岗翻案,被禁止出书。“文革”后期,以《金光大道》为范本,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的驱动下,炮制出了不少像《千重浪》一样的政治垃圾。

“文革”结束以后的最初几年,诗歌出版成了文学出版的主角。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和《革命诗抄》,拉开了文学“轰动效应”的序幕。1980年前后,中短篇小说的繁荣如磁铁一样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诗歌出版转冷,但“朦胧诗”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歌论争,使诗歌出版再度回暖。据统计,1981至1983年,历年出版的诗集数量分别为91种、121种、160种,1984年更是超过了200种。^②在朦胧诗热潮降温后,诗歌出版在文学出版的格局中逐渐边缘化,小说出版一

^① 1953—1958年和1960—1969年间,作家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因而,其间出版图书的版权资源归属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参阅寇晓伟《蓦然回首 星光灿烂——建国40年文学出版述略》,《中国出版》1992年第6、7、8期连载。